

中国古代诗话的文化考察

张 伯 伟

诗话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，自宋代以降，已为人们所广泛运用。由于其数量繁夥，内容驳杂，很难一概而论。尤其是诗话这种形式的包容性很强，章学诚认为其可“通于史部之传记”，又可“通于经部之小学”，还可“通于子部之杂家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卷五《诗话》）；再加上欧阳修撰《诗话》，便规定了“以资闲谈”的基本写作态度，谈的内容虽然以诗为主，实际上又并不限于诗。所以，从宋代开始，由于各个时代的文化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，因而各个时代的诗话也就或深或浅留下了特定的印记，形成其时代标志。从文化角度研究诗话的时代标志，一方面便于学者谨慎而准确地使用此类文献；另一方面，也能帮助人们透过诗话这一射角，窥见各个历史阶段在思想、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时代折光。本文不是全面考察此一问题，而是就诗话的发展过程中，指出若干易于为人忽略而又值得重视的问题，分作五个方面作一概略性的论述。

一 宋代诗话与党争

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卷五《诗话》中有这样两段话：

论文考艺，渊源流别，不易知也。好名之习，作诗话以党同伐异，则尽人可能也。以不能名家之学，入趋风好名之习，挟人尽可能之笔，著惟意所欲之言。可忧也！可危也！

说部流弊，至于诬善党奸，诡名托姓。前人所论，如《龙城录》、《碧云騞》之类，盖亦不可胜数。……事有记载，可以互证，而文则惟意之所予夺。诗话之不可凭，或甚于说部也。

章学诚指出的古人为了政治斗争而伪撰说部文字，所举两例，一为托名柳宗元的《龙城录》二卷，一为托名梅尧臣的《碧云騞》。在政治斗争中，伪撰文字，“诡名托姓”，这种情况开始于唐代。如牛李党争中，李德裕的党羽韦瓘作《周秦行记》，栽名于牛僧孺，即为其中一例。^①所以韩愈在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中曾指出：“传闻不同，善恶随人所见，甚者附党憎爱不同，巧造言语，凿空构立善恶事迹。”（马通伯《韩昌黎文集校注·外集》上卷）这种情况，至宋代而愈演愈烈。朋党问题，也为宋代关心国事的士大夫所究心。而政治见解的不同，每每影响到用人的差异，于是，往往互目对方为朋党。《宋元学案》卷三《高平学案》“睢阳所传”范仲淹小传载：“初，先生以忤吕夷简，放逐者数年。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为朋党。”更有甚者，执政秉权者有时还藉此以排斥异己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欧阳修、苏轼等人才有《朋党论》、《续朋党论》之作，以廓清是非。党争问题，在宋代几经反复，影响很大，全祖望甚至称之为“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”（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六《元祐党案序录》）。除了政治上的党争以外，在学术上也有派别之争，从而影响到宋代的诗文评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余师录》提要云：“宋人论文，多区分门户，务为溢美溢恶之辞。”又同卷《文章精义》提要赞美此书云：“持平之论，破除洛、蜀之门户，尤南宋人所不肯言。”从这两段话中，可略见宋人论文话诗所受到的政治与学术之争的影响。不过，就对宋代诗话的影响而言，新旧党争要大于其它政治或学术之争。^②

宋代的新旧党争，主体上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与司马

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斗争。关于这一党争双方的功过是非，历史上的评价纷纭不一，本文暂不涉及。党争在诗话上的反映，基本上也是有两大系列：其一是追随王安石为首的熙宁诸公，此为“熙宁派”；另一是追随苏轼、黄庭坚为首的元祐诸公，此为“元祐派”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，其中还有许多复杂情况。现择其较主要、较突出的，举例如下。凡前人已有论者，则先列其说，并略加案语。

（一）熙宁派

1. 魏泰《临汉隐居诗话》

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十二引《桐江诗话》云：“魏道辅泰，襄阳人，元祐名士也，与王介甫兄弟最相厚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三《东轩笔录》提要云：“泰，襄阳人，曾布之妇弟。为人无行而有口，颇为乡里患苦。元祐中，记其少时公卿间所闻成此编。其所是非，多不可信。心喜章惇，数称其贤，则大概可知矣。”（王先谦校本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临汉隐居诗话》提要：“泰为曾布妇弟，故尝托梅尧臣之名，撰《碧云騞》以诋文彦博、范仲淹诸人。及作此书，亦党熙宁而抑元祐。如论欧阳修则恨其诗少余味，论黄庭坚则讥其自以为工，论石延年则以为无大好处，论苏舜钦则谓其以奔放豪健为主，论梅圣俞则谓其乏高致，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佳句。盖执门户之私，而甘与公论相左者。”案：除以上数说所举例以外，诗话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。如阿谀章惇“自少喜修养，服气辟谷，飘然有仙风道骨。”又书中不仅推崇王安石处不一而足，而且还盛称其妹、其女、其妻等人的诗作，誉之“往往有臻古人”，“皆洒脱可喜也”，不足为据。

2. 蔡絛《西清诗话》

费衎《梁溪漫志》卷八“蔡絛著书”条云：“著书甚多，大抵以奸言文其父子之过，此固不足怪。”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卷

下云：“元祐间，东坡与曾子开肇同居两省，扈从车驾，赴宣光殿。子开有诗，……坡两和其断句‘辛’字韵皆工，……云‘最后数篇君莫厌，捣残椒桂有余辛。’……盖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，喻贤人也。诗人押险韵，冥搜至此，可谓工矣。而《西清诗话》遂改其句云：‘读罢君诗何所似，捣残椒桂有余辛。’以谓坡讥唱首多辣气，此何理也？坡为人慷慨疾恶，亦时见于诗，存古人规讽体，然亦詎肯效閤閤以鄙语相詈哉！恐误后人心术，不得不辨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四十一《铁围山丛谈》提要云：“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则载條作《西清诗话》，多称引苏、黄诸人，竟以崇尚元祐之学，为言者论列。盖虽盗权怙势，而知博风雅之名者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称《西清诗话》乃條使其客为之。”案：《西清诗话》的情况颇为复杂。首先，书中引录了不少元祐诸公的言论及诗词；其次，蔡條曾因此书而“落职勒停”。那么，这部诗话能否归入熙宁派呢？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或认为是蔡條之客所为；而蔡條因此书而得祸，《宋诗话考》上卷甚至誉之为“彼于苏、黄势替之后，不党于其父，而独崇元祐之学，亦可谓特立独行者矣。”然而考之史乘，蔡條深受其父蔡京之宠，助父为奸，窃弄权柄，其为人决非“特立独行”之类。看来，论者在考论这一问题时，可能忽略了某些关键性的文献。事实上，《西清诗话》正是在蔡京的授意下撰成的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“蔡元长欲为张本”条载：“元长（京）始以绍述两字，劫持上下。擅权之久，知公议之不可以久郁也。宣和间，始令其子约之（條），招致习为元祐学者。是以杨中立、洪玉父诸人皆官于中都。又使其门下客著《西清诗话》，以载苏、黄语，亦欲为他日张本耳。”这才是《西清诗话》中多载元祐诸公语的真正原因。而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，彼此都会相互寻隙伺机以攻讦对方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十曾载：“崇宁中，蔡鲁公当国。士人有陈献利害者，末云：

‘伏望闲燕，特赐省览’。有得之欲谗公者，密摘以白上，曰：‘清闲之燕，非人臣所得称，而鲁公受之不以闻。’鲁公引《礼·孔子闲居·仲尼燕居》自辨，乃得释。”而《西清诗话》之多载苏、黄语，也正好授人以口实。故“臣寮论列，以为條所为私文，专以苏轼、黄庭坚为本，有误天下学术，遂落职勒停。”

（《独醒杂志》卷二）这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另外，从诗话本身来看，其中对其父蔡京（元长、鲁公）及其叔父蔡卞（文正）的诗作及言论多有引述，作品及见解并不高明，而书中引之再三，实为溢美之辞。所以，《西清诗话》仍应算是熙宁派的作品。

3. 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

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二十四云：“石林叶梦得少蕴以妙年出蔡京之门，靖康初守南京，当罢废。胡文定公安国以其才，奏谓不当因蔡氏而弃之。实有文学，诗似半山。然《石林诗话》专主半山而阴抑苏、黄，非正论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石林诗话》提要云：“是编论诗，推重王安石不一而足。盖梦得出于蔡京之门，而其婿章冲则章惇之孙，本为绍述余党。故于公论大明之后，尚阴抑元祐诸人。”潘德輿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七云：“叶石林《诗话》颇多可采。其最误人者，好取荆公诗句以教人，而实皆庸下。”案：在宋人诗话中，《石林诗话》是较好的一部。所以《四库提要》在指出其阴抑元祐诸人之后，又云“略其门户之私，而取其精核之论，分别观之，瑕瑜固两不相掩矣。”《石林诗话》作于建炎初年，党禁不严，故其中党争的痕迹的确并不明显。但书中对章惇、王安石的曲为回护，用心良苦之处，未尝不是出于某种需要。例如，卷上载元丰间，苏轼系大理狱，王珪欲构东坡之罪而罗织文网，奏知神宗。特别写到章惇（子厚）“以旁解之，遂薄其罪。子厚尝以语余，且以丑言诋时相（案：即王珪），曰：‘人之害物，无所忌憚，有如是也？’”

而事实上，章惇是一个谋陷元祐旧臣、专以绍述为事的重要人物。这段记载无非是事过境迁之后，美化章惇之辞。

4. 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

这一诗话从宋代起就有人怀疑非陈师道之原作，经过方回、纪昀，直至现代郭绍虞等人的辨析，这一怀疑已成为定论。^③那么，是什么人又是出于何种目的伪托的呢？《宋诗话考》卷上《后山诗话》云：“窃以为师道受苏、黄影响至深，而书中对苏、黄转多不满之词，此为最易引人生疑之处。然师道诗‘人言我语胜黄语，挟竖夜燎齐朝光’，稍有自负习气，或当时如魏泰、叶梦得之流即利用此弱点，以攻击苏、黄之语，托为《后山诗话》之辞，未可知也。然则此书殆为利用后山之名，以逞门户之私者之所为矣。”另有一则材料，或可为郭氏此说旁证。司马光在当时素以清廉正直、道德崇高为海内所称，而《后山诗话》则记其私狎营妓，为王安石所戏。所以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三指出：“凡小说记载，多朝贵及名公之事，大抵好事者得之传闻，未必皆实。……若某诗话记司马温公私狎营妓，王荆公以诗戏之，其为污染名德甚矣。盖温公固不为此，荆公端人，追之戏之，恐亦非其屑为也。辟而不信为宜。”社会上的传闻固然无法杜绝，但加以记载则决非无目的之举。这一记载也的确影响深远，后人甚至有将它辑入小说中者（如冯梦龙《情史》卷十五“情芽类”）。以讹传讹，众口铄金。其源盖出于此。

（二）元祐派

1. 许颢《彦周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彦周诗话》提要云：“盖亦宗元祐之学者，所引述多苏轼、黄庭坚、陈师道语，其宗旨可想见也。”《宋诗话考》上卷《许彦周诗话》云：“书中自谓其‘伯父在熙宁间为荆公荐，竟不委曲得贵达，然亦为司马温公、吕献可、吕微仲、范尧夫诸公所知’。又‘季父仲山在扬州时事东

坡先生’云云，则知《提要》据其与惠洪面谈之语，称其宗元祐之学，亦可信也。……彦周自言尝与惠洪论诗，而李端叔、高秀实皆其父执，则其论诗宗旨本于苏、黄，而于黄尤近可知。”案：《彦周诗话》自序谓“数得奉教，闻前辈长者之余论，……其能记忆者，因笔识之”，可知此诗话立论之渊源。其中征引，多元祐诸公的议论，并对之推崇不已。又多述其先人与苏轼等人的交谊。诗话中另有一段记载，则是记其季父仲山（即曾在扬州事东坡者）在政和年间因作诗而遭贬，“台章论列，作诗有害经旨，遂报罢，调南剑州顺昌县府”。此则间接受到元祐诸人的牵连。④

2. 吕本中《紫微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紫微诗话》提要云：“其学出于黄庭坚，……然本中虽得法于豫章，……实不专于一家。”

《宋诗话考》上卷《紫微诗话》云：“盖吕氏家学渊源，有中原文献之目，而又及见元祐诸人，讲习渐渍，故遗闻轶事颇赖以传。……至其推崇义山，又与朱弁所谓‘黄庭坚用崑体工夫’（案：此语见《风月堂诗话》卷下）之语相合，……是则是书论诗虽谓其专于一家、主于一格可也。”案：吕本中与元祐党人关系颇有渊源，其曾祖吕公著、祖父吕希哲、从祖吕希纯、吕希绩等人均名列元祐党籍，表叔范温（元实）又“从山谷学诗”（《紫微诗话》）。所以，其诗话对元祐诸公备加赞美。其中两则，微婉志晦，尤堪回味。其一，潘邠老有《哭东坡绝句十二首》，《紫微诗话》独载以下二首：“元祐丝纶两汉前，典型意得宠光宣。裕陵圣德如天大，谁道微臣敢议天？”“公与文忠总遇谗，谗人有口直须缄。声名百世谁常在？公与文忠北斗南。”这两首绝句在艺术上无可称道，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，大可不必载入。其二，诗话中录王安石寄吕公著的一封信，与诗毫不相干。史载吕氏因反对王安石推行青苗法，并反对其任用吕惠卿等人，遭贬

出知颍州。而王安石这封信的内容却正是自悔其用人不当。略云：“以安石之不肖，不得久从左右，以‘求其放心’而稍进于道。猥以私养窃禄，所以重贪污之罪。惓惓企望，何以胜怀。因书见教，千万之望。”藉此以表明推行新法之多用佞人。如果不是同情元祐党人，在诗话中是决无必要录此书信的。《艇斋诗话》也曾指出：“吕东莱（本中）喜令人读东坡诗。”又云：“东莱不喜荆公诗。”可悟其中消息。曾季狸师事吕本中，人称“直谅多闻，古之益友”（张栻《送曾裘父序》，《南轩文集》卷五），其言当可信。

3. 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风月堂诗话》提要云：“是编多记元祐中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陈师道、梅尧臣及诸晁遗事。”案：朱弁对元祐诸公深表同情，溢于言表。如卷上载苏轼“君与我同好”诗，中有“惜哉嵇、阮放，当世已不容”，谓其句“遂成诗讖，亦可怪也。”又卷中载：“韩师朴元符末自大名入相，其所引正人端正，遍满台阁，然不能胜一曾布。而张天觉于政和初，欲以一身回蔡京党绍述之论，难矣！”韩师朴即韩忠彦，名列元祐党籍。

4. 张表臣《珊瑚钩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珊瑚钩诗话》提要云：“表臣生当北宋之末，犹及与陈师道游，与晁说之尤相善，故其论诗往往得元祐诸人之余绪。”案：张表臣诗话中亦有涉及党争者。如卷一云：“东坡作诗，叹贾梁道为魏忠臣，然不能绍其子于后。……呜呼！岂忠孝之道，父不能传之于其子，子不能献之于其父耶？熙（宁）、（元）丰间，王氏变法，新进附之，而仲弟平甫讥焉，不其贤乎？”又卷二载其与晁以道互以诗赠酬，乃云：“盖公元祐党人之家，上书邪等，禁锢不得仕二十余年。”即为明显之例。

5. 吴聿《观林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观林诗话》提要云：“聿之诗学出于元祐，于当时佚事，尤所究心。”案：吴聿在诗话中盛称元祐诸公，而对王安石则不免有微词。诗话载杨元素（绘）疏，论王安石云：“臣闻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，尝闻其诗曰：‘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’今睹其行事，已颇类矣。愿陛下详其言而防其志。”又云：“半山晚年所至处，书窗屏间云：‘当时诸葛成何事，只合终身作卧龙。’盖痛悔之词。”其实，王安石书唐人薛能《游嘉州后溪》绝句中的此两句，乃表示其激愤之情。“痛悔”云云，殊失荆公称引之意。

6. 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庚溪诗话》提要云：“于元祐诸人，征引尤多。盖时代相接，颇能得其余绪，故所论皆具有矩矱。”案：此诗话颇多涉及党争之事，而商榷议论之间，则又贬斥熙宁而褒扬元祐。

以上就“熙宁派”和“元祐派”分别举例说明了宋代党争对诗话的影响。了解了这一点，在使用这些诗话时，尤其是涉及到对当时人的行事记载及诗歌评论时，我们就能够洞悉其辞，辨同苍素，而不为“溢美溢恶”的门户之私所惑。

二 宋代诗话与禅学

以禅喻诗，在宋代诗话，尤其是在南宋诗话中是颇为普遍的。影响最大的，则是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。

禅宗自六祖慧能创立以后，传其学者有南岳怀让、青原行思及荷泽神会。神会一系，数传遂绝；怀让、行思二系，则日益隆盛，演变出五家七宗（《圆悟佛果禅师语录》卷十六），至宋代而影响广大深远。当时的文人学士，几乎无不谈禅，从而将参禅与论诗结合起来，最早的当数苏轼。其《夜直玉堂，携李之仪端叔诗百

余首，读至夜半，书其后》诗云：“暂借好诗消永夜，每逢佳处辄参禅。”（孔凡礼点校《苏轼诗集》卷三十）而宋人论诗，也往往撷拾禅家话头，以沟通诗心与禅心。如“眼”、“悟”等术语，固然十分明显，而江西诗派理论主张之一的“点铁成金”说，也是来自禅家。（《见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八《杭州龙华寺灵照禅师》、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翠岩令参禅师》）江西诗派的另一理论曰“夺脱换骨”，恐亦出自禅宗。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《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师》载：“翌日觉头痛如刺。其师欲治之，空中有声曰：‘此乃换骨，非常痛也。’”）其后，有人将此二句相提并论，如陈善《扞虱新话》上编卷二“文章有夺脱换骨法。”）禅与诗，就其本质上而言，是不能相并比的。刘克庄《题何秀才诗禅方丈》云：“诗家以少陵为祖，其说曰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。禅家以达摩为祖，其说曰‘不立文字’。诗之不可为禅，犹禅之不可为诗也。”（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九十九）但以禅入诗，主要是指要使诗中含蕴禅趣、禅味，从而显得空灵剔透、不脱不粘。所以，从这一角度出发，也就可以将诗与禅相提并论。刘迎《题吴彦高诗集后》云：“诗到西江别是禅。”（《中州集》卷三）元好问《答俊书记学诗》云：“诗为禅客添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。”（《遗山诗集》卷十四）则就双方可以互补而言。由此论之，宋代诗话经常以禅喻诗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宋代诗话中以禅喻诗者，较突出的有《石林诗话》、《潜溪诗眼》、《藏海诗话》及《沧浪诗话》等。由于禅语贵灵、贵活，而习禅又贵自得、贵妙语，所以，读宋人诗话，遇到其以禅喻诗处，往往解人难索。对禅学理解不深，对诗学体悟不透，固然难得其谛；即使深谙禅学，熟精诗理，但彼此着眼点不同，也往往难以印证。试举二例以明之。

例一：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：“学汉、魏、晋与盛唐之诗者，临济下也。学大历以还之诗，曹洞下也。”从禅宗史上来

看，临济宗出于南岳怀让，曹洞宗出于青原行思，各为五宗之一，并无高低之别。这是禅宗史上的常识，严羽焉有不知之理。所以，这段话并不是以汉魏盛唐之诗与大历以还之诗的上下来比况临济、曹洞，以至于在二宗之间有所轩轻。后人一方面未细究禅学，另一方面也未细究严氏之语，遂纷纷诋毁严羽。李维桢《读苏侍御诗》云：严沧浪“论诗则是，论禅则非。临济、曹洞有何高下？”（《大泌山房集》卷一百二十九）钱谦益《唐诗英华序》云：“严氏以禅喻诗，无知妄论。……谓学汉魏、盛唐为临济宗，大历以下为曹洞宗，不知临济、曹洞初无胜劣也。”（《有学集》卷十五）实际上，严氏这里讲的是学诗的方法问题（其重点在“学”），而不是二者的高下问题。今人杜松柏著《禅学与唐宋诗学》，始将此一问题予以澄清。杜氏指出：“临济不主理入，不住行人，无证无修，当下荐取，沧浪以喻汉魏晋与盛唐诗之浑成无迹，仅能以临济当下荐取之直感法求之；而曹洞则立君臣正偏五位，偏于理入，以比论大历以后之诗，人巧发露，可由格律及章句等之诗法求之，能依理索解，二宗之成就相等，难分高下，其参禅之方法，则各有别，取以比论，有何不可？”（见上书）杜氏此辨甚当，足破千古之惑。关于临济、曹洞宗风的差异，《人天眼目》释之甚详，此处不赘。宗风不同，其接引人的方式便有异；根据宗风的不同，以论从学途径的不同，或者根据诗歌风格的差异，而以不同宗派比论之，这在宋人论诗中是颇为普遍的，严羽也不过是承接此绪而已。指出此点，正可以作为杜氏之说的佐证。蔡條《百衲诗评》云：“黄太史诗，妙脱蹊径，言谋鬼神。唯胸中无一点尘，故能吐出世间语。所恨务高，一似参曹洞下禅，尚堕在玄妙窟里。”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十三引）吴炯《五总志》云：“（山谷）始受知于东坡先生，而名达夷夏，遂有苏、黄之称。坡虽喜出我门下，然胸中似不能平也。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，师坡者萃于浙右，师

谷者萃于江右。以余观之，大似云门盛于吴，临济甚于楚。云门老婆心切，接人易与，人人自得，以为得法，而于众中求脚跟点地者，百无二三焉。临济棒喝分明，勘辩极峻，虽得法者少，往往崭然见头角。……噫！坡、谷之道一也，特立法与嗣法者不同耳。”^⑤任渊《后山诗注目录序》云：“读后山诗，大似参曹洞禅，不犯正位，切忌死语。非冥搜旁引，莫窥其用意深处。”无论其比喻是否确切，但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，即宋人的以禅喻诗，经常是以宗风的不同来比喻诗格的差异，以立法方式的不同来比喻学诗途径的差异。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以临济、曹洞相比，也是由此一脉相承的。所以，对宋代诗学中以禅喻诗的进一步分析，还有待于学者对禅学本身下一番深切的功夫。

例二：《石林诗话》卷上：“禅宗论云门^⑥有三种语：其一为随波逐浪句，谓随物应机，不主故常；其二为截断众流句，谓超出言外，非情识所到；其三为函盖乾坤句，谓泯然皆契，无间可伺。其深浅以是为序。余尝戏谓学子言，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，但先后不同。‘波漂菰米沉云黑，露冷莲房坠粉红’为函盖乾坤句；以‘落花游丝白日静，鸣鸠乳燕青春深’为随波逐浪句；以‘百年地僻柴门迥，五月江深草阁寒’为截断众流句。若有解此，当与渠同参。”禅宗和尚的教语往往是以三句禅联，故称“三关”（初关、重关、牢关，或曰空关、有关、中关）。万松老人评唱《从容庵录》卷五第七十六则“首山三句”云：“夫教语皆三句相连，初、中、后善。”（《大藏经》第四十八册）巴壶天教授《禅宗三关与庄子》亦指出：“禅宗自南岳青原二支，下分五家七派，各家宗旨，花样百出，且愈出愈奇。然其旨归，固仍不外乎三关也。”（《艺海微澜》）而“云门三句”实际上也就是“云门三关”。《人天眼目》卷二“三句”云：“（云门偃）师示众云：‘函盖乾坤，目机铄两，不涉万缘，作么生承当？’众无对。自代云：‘一簇破三关。’后来德山圆明密禅师，遂离其语

为三句：曰函盖乾坤句，截断众流句，随波逐浪句。”（《大藏经》第四十八册）但是，即使弄清楚“云门三句”的来龙去脉，对叶氏的以禅喻诗也还是颇难把握的，至少有以下几个疑点要解决：

其一，对“云门三句”的解释，如果将当时的禅师之说与叶氏之说相比较起来，可以看出是人言言殊。这或许是因为禅本来就

解 说 禅 师	云 门 三 句	函盖乾坤	截断众流	随波逐浪	出 处
		归 宗	三 祖	云 居	首 山
		日出东方夜 落西	铁蛇横古路	船子下扬州	《人天眼目》 卷二
		海晏河清	水泄不通	波斯咤落水	同 上
		合	窄	阔	同 上
		大地黑漫漫 普天匝地 海底红尘起	不通凡圣 泊合放过 横身三界外	要道便道 有问有答 此去西天十 万八千	同 上
		只闻风击响， 知是几千竿	昨夜寒风起， 今朝括地霜	春煦阳和花 织地，满林 初啖野莺声	同 上
		合	好	随	《五灯会元》 卷十二
		天地有星皆 拱北	大地坦然平	春生夏长	同上卷十五
		匝天普地	佛祖开口无 分	有时入荒草， 有时上孤峰	同上卷十六

是只能参、不能解的，真参实证，原就是得之于个人的，很难求得统一。但如果彼此间得不出一个大致相近的结论，以禅喻诗又从何喻起呢？现将《人天眼目》及《五灯会元》所载诸禅师对此三句的解说去其重复，凡八家十说，见上表，以便观览。

其二，叶氏以“随波逐浪”、“截断众流”、“函盖乾坤”三句相次，并指出“其深浅以是为序”，但这种“序”并非一成不变。如智才禅师以“截断众流”、“随波逐浪”、“函盖乾坤”为序（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二）；西禅钦禅师则以“函盖乾坤”、“截断众流”、“随波逐浪”为序（同上，卷十五）；而元妙禅师则以“截断众流”、“函盖乾坤”、“随波逐浪”为序（同上，卷十六）。所以，并不是以叶氏的“序”为“序”的。其实，根据一般的了解，若以功夫深浅的进阶为序的话，也应该是以“截断众流”（初关，由凡入圣）、“随波逐浪”（重关，由圣入凡）、“函盖乾坤”（牢关，不堕凡圣）相次。

其三，叶氏云“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，但先后不同”，这也颇难理解。是指写作时间上的先后不同，还是指诗学造诣上的先后不同？若指前者，则叶氏所举诗例，“波漂”联出自《秋兴八首》，作于大历元年（766）；“落花”联出自《题省中院壁》，作于乾元元年（758）；“百年”联出自《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并携酒饌得寒字》，作于宝应元年（762），次序上是颠倒错乱的。若指后者，则先之以“函盖乾坤”，或指杜诗的工夫乃“从上做下”，“从顶颈上做来”（借用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语），但根据叶氏的次序，“从上做下”当继之以“截断众流”，而不是“随波逐浪”才对。或者此所谓“先后不同”乃指与“云门三句”的次序不同，但叶氏所举诗例，在次序上若无深意的话，只消将第一例与第三例换置，便与其“云门三句”的次序一致了，也无所谓“先后不同”。

所以，禅语的灵活生动，诗语的剔透明彻，其能引起人们的联

想是丰富的，人们的体会也可以是多样的。以此一体会去揣摩彼一体会，如果没有充分的旁证，很象以此一密码破译彼一密码，是很难理解、把握的。对叶氏这段话的解释虽有几家之说，但似乎都难以使人信服。这或许是以禅喻诗本身所带来的不易克服的弊病。

三 诗话与刻书业

经济的发展，往往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发展。就刻书业而言，自北宋熙宁以后，擅刻之禁松弛，民间的坊刻、私刻便大大发展起来，盛况空前。而诗话与刻书业的关系，也可以追溯至宋代。宋代刻书，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指出：“今天下印书，以杭州为上，蜀次之，福建最下。……福建本几遍天下。”如果我们将宋代诗话作者的地域作一统计的话，则会发现，其中福建人是很多的。兹将宋代诗话中可考的福建籍作者列表如下，便可一目了然（见下页）。

当时刊刻、流传的诗话，其作者以福建籍居多，这与宋代福建地区刻书业的发达是有着内在联系的。

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五“明人私刻坊刻书”条云：“自宋至明六百年间，建阳书林，擅天下之富。”建阳属福建建宁府。但是，明代诗话与刻书业的关系，却不是如宋代那样，由于刻书业的发达而导致诗话作者众多，而是由于与明人的刻书风气相联系，出现了一些颇为独特的现象。总括起来看，可归结为两方面：

其一，出现了众多的诗话总集。明代人喜爱刻书，而且几乎所有的书皆可私刻，刻工又极廉。再加上官僚们附庸风雅，“多以（书）馈送往来，动辄印至百部”（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十），当时就流传着一种“书帕本”。所以，明人好尚刻书。就明代的诗坛来看，诗社林立，此起彼伏。文人结为吟社，便往往商兑丽

宋代诗话福建籍作者一览表

姓 名	籍 贯	书 名
方 深 道	莆 田	《集诸家老杜诗评》
黄 彻	莆 田	《碧溪诗话》
蔡 梦 弼	建 安	《草堂诗话》
严 羽	邵 武	《沧浪诗话》
魏 庆 之	建 安	《诗人玉屑》
刘 克 庄	莆 田	《后村诗话》、《江西诗派小序》
蔡 傅	莆 田	《吟窗杂录》、《历代吟谱》
陈 晔	福 州	《陈日华诗话》
敖 陶 孙	福 州	《敖器之诗话》、《臞翁诗评》
黄 昇	闽	《玉林诗话》
严 有 翼	建 安	《艺苑雌黄》
郑 揆	莆 田	《熊掌诗话》
方 铨	莆 田	《续老杜诗评》
吴 涇	莆 田	《杜诗九发》
李 方 子	邵 武	《公晦诗评》
赵 彦 慧	南 安	《春台诗话》
黄 鍾	仙 游	《锦机诗话》

泽。而诗话既可作为商榷议论的典要，其本身又是“以资闲谈”的资料。于是，明代人除了自己撰著诗话以外，还大量地汇辑诗话总集。而社会上对此类书籍的大量需要，书贾为了射利，也就大量予以刻印。明代的诗话总集可分两类：一类是将诸诗话较

完整地收集在一起，清代何文焕辑《历代诗话》正是循此而来。其中有专收一代的诗话总集，如杨成玉的《诗话》辑宋人诗话十种，周子文的《艺薮谈宗》则专辑明人诗论。也有不限于一代的，如稽留山樵编的《古今诗话》，即汇编了唐宋元明的论诗之作数十种。另一类则是分门别类，而将各家诗话以类相从。这类总集，在宋代已有《诗话总龟》、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及《诗人玉屑》等，但明代要更多一些。较著名的有单字的《菊坡丛话》、朱宣璲的《诗心会珠》、王昌会的《诗话类编》、陈云式的《诗脍》及佚名的《艳雪斋诗评》等。

其二，出现了大量改头换面的诗话之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《诗话总龟》提要云：“此本为明月窗道人所刊，并改其名为阮一阅，尤为疏舛。……前有郴阳李易序，乃曰阮子旧集颇杂，月窗条而约之，汇次有义，棼结可寻。然则此已经改窜，非其旧目矣。”《书林清话》卷七“明人不知刻书”条引上文而断之云：“可知朱明一朝刻书，非仿宋刻本，往往羼杂己注，或窜乱原文。如月窗之类，触目皆是。”这是指的对原有诗话的改窜。另外有一突出现象，则是书贾自笔记杂说中辑出论诗部分，而诡题一诗话之名，藉以兜售牟利。即以现今流传的诗话而言，为明人凑合成编并诡题书名的就有不少。略举如下：

1. 释文莹《玉壶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玉壶诗话》提要：“此本为《学海类编》所载，仅寥寥数页。以《玉壶清话》校之，盖书贾摘录其有涉于诗者，裒为一卷，诡立此名，而曹溶不及辨也。”案：《玉壶诗话》不见宋、元人征引，其伪托成书当在明代。其谬不仅在诡题书名，而且其摘录工作也甚为粗疏。例如，“窦禹钧生五子”条摘自《玉壶清话》卷二，其“致仕于家，八十三终，諡仁惠公”十二字，是同卷“许仲宣”条的内容，而摘录者误抄为一，即为其例。

2. 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艺苑雌黄》提要：“盖有翼原书已亡，好事者摭拾《渔隐丛话》所引以伪托旧本，而不能取足卷数，则别攘《韵语阳秋》以附益之。”《宋诗话考》中卷《艺苑雌黄》：“考《万卷堂书目》杂文类有《艺苑雌黄》十卷，严有翼撰。则知摭拾成书当在明代矣。”

3. 朱熹《晦庵先生诗话》

《宋诗话考》中卷《清邃阁论诗》：“明沈爚纂集《晦庵先生诗话》一卷。……盖就文集中其他论诗之作，均采录之，不限语录故也。……考文征明《甫田集》卷十七有《晦庵诗话序》，称‘练川沈文韬氏……取凡朱子平日论诗之语，萃而成书，曰《晦庵诗话》’，当即此书。”据郭氏所考，此书乃成于明代。

4. 张鎰《诗学规范》

《宋诗话考》中卷《诗学规范》：“张氏所著只有《仕学规范》四十卷，而此书则系后人从《仕学规范》中辑其论诗部分别出成书者……是书之别出成书，当在明代。《澹生堂书目》称《诗法统宗》中有《诗学规范》一卷，此当为辑出别行之最早者。”案：《诗法统宗》为明人胡文焕所编诗话总集，《澹生堂书目》为明人祁承燾所编。可知此诗话由明人编纂。

5. 吴子良《吴氏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吴氏诗话》提要：“此书载曹溶《学海类编》中，题曰吴氏撰。今检其文，即吴子良《林下偶谈》中摘其论诗之语，非别一书也。”刘声木《苕楚斋四笔》卷七：“窃意宋人诗话虽多，明人及国朝人业已搜刻于各种丛书中，有多至数本者。此编（案：指吴氏《荆溪林下偶谈》）品评诗文，尤不苟作。独惜仅有《宝颜堂秘笈》本，又不知何以有姓无名。卷末拙修居士郁嘉庆跋，谓昔分为捌卷，今作肆卷云云，是卷数复有改并。……不知于原本有无去取，以无他本可校。明人

刻书，但凭一己之爱憎，随意去取，实为恶陋。”案：《荆溪林下偶谈》原本八卷，明人改作四卷，凡一百一十八条。《吴氏诗话》二卷，凡三十八条，乃从四卷本中辑出，则此书亦成于明代。

6. 陈秀民《东坡诗话录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东坡诗话》提要：“秀民既元人，而书中乃引《西湖游览志》一条，是书乃明田汝成作，秀民何自见之？曹溶《学海类编》喜造伪书，此类亦可疑者也。”案：检《东坡诗话录》引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二条，又有标明“燕石斋补”者十余条。据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二十三载，张士诚据有平江时，“参军陈庶子、饶介之在张左右。”陈庶子即陈秀民。张氏据平江为元至正十六年事，去元亡仅十二年，可知陈秀民乃元末人，则燕石斋必为明人，书中所引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亦当为其所补。曹溶为清初人，编有《学海类编》八十六卷，收书四百三十种。其选录取择虽严，然亦常有为书贾所蒙而不及辨者。他自己似不至于掇拾割裂原书而诡题一名，《提要》所论，似可商榷。

7. 何孟春《余冬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余冬诗话》提要：“是书载《学海类编》中，今检其文，实于孟春《余冬序录》中摘其论诗者诡题此名也。”案：何孟春乃明人，则摘录其论诗之语而成诗话者必在明代无疑。

同样的情况还有，如王世贞《全唐诗说》、《诗评》之出于其《艺苑卮言》，胡震亨《唐诗谈丛》之出于其《唐音癸签》，均为其例。

8. 李攀龙《诗文原始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诗文原始》提要：“此书自明以来，不闻为攀龙所作，其持论亦不类攀龙语。疑亦曹溶掇

拾割裂之书，伪题攀龙名也。”案：此书当为明人伪托，而曹溶误收入《学海类编》之中。

9. 李日华《恬志堂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恬志堂诗话》提要：“此编载曹溶《学海类编》中，乃摘其诸杂著中论诗之语凑合成编。……是直不通书贾所摘矣。至日华堂名‘恬致’，其集即名《恬致堂集》，而改曰‘恬志’，尤耳食之误也。”

10. 陈继儒《余山诗话》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余山诗话》提要：“此书别无传本，惟《学海类编》载之。然其文皆摭拾继儒他说部而成，殆非其本书。”

上文仅就流传至今的诗话举例说明，这类情况，实际上远不止此数。

由于诗话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所占的实际位置较低，而明人刻书又多喜妄立名目、改窜旧文，所以，对于以上的现象，人们也就多取否定的态度。这并不公允。无论当时书贾主观上是如何作想的，这些书在客观上还是有其可取之处。首先，诗话总集保存了大量的文献材料。现在流行的何文焕的《历代诗话》，是清代乾隆年间所编。此后，人们才又纷纷编辑了《历代诗话续编》

（丁福保）、《清诗话》（丁福保）、《古今诗话丛编》（广文书局）、《古今诗话续编》（广文书局）、《清诗话续编》（郭绍虞）以及《清诗话访佚初编》（杜松柏）等大型诗话总集，成为今日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。而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此类总集的编纂工作的，正是明代人。其次，诗话的分类编纂，始于宋而盛于明。此类书的好处一者是保存文献，二者是便于检索。虽然不能代替原典，但也能提供人按图索骥。今人还有从事此类工作者，如台静农的《百种诗话类编》、朱任生的《诗论分类纂要》等，往往为学者所乐于参考。第三，将同一作

者散见于不同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加以汇辑编纂，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专题文献整理的性质，这项工作今后还将继续下去。总之，应该批评的不是这些工作本身，而是明人从事这些工作的态度和方法。比如，陈云式编《诗脞》八卷，将诸家诗话分类编纂，但却略其出处。这不能不影响到它的文献价值。明代书贾旨在牟利，往往难以顾及质量。所以顾炎武不无过分地愤慨云：“有明一代之人，其所著书，无非盗窃而已。”（黄汝成《日知录集释》卷十八）这与当时的刻书风气是有着一定的连带关系的。

四 清代诗话与考据

诗话之有明确的著述宗旨，始于宋人许颢的《彦周诗话》，其中“正讹误”一条，已约略涉及到考据的问题。在诗话体的初创阶段，其作者如欧阳修、司马光、刘攽等人，均为博洽多闻之士，但由于其时仅视诗话为“以资闲谈”的材料，所以，一方面其考据的功夫不会藉诗话来表现，另一方面，由于写作态度的轻松随便，书中偶涉考据，亦往往有误。而到了南宋，这一情况有所改变。许颢的诗话正是此一转换的关键。以后便出现了一些以考据见长的诗话，如吴聿的《观林诗话》、周必大的《二老堂诗话》等。严羽论诗主“趣”尚“悟”，但其《沧浪诗话》也专列有“考证”一节。不过，考据成为诗话的时代特色之一，则是到了清代才出现。

清代的考据学风，自顾炎武创其首，乾、嘉诸老扬其波，遂笼罩了整个学术界，而诗话也受其影响。这种影响，可大分为正面与负面两端。

首先看正面的影响。清代诗话在内容上多涉考据之学。例如，年谱在传统的目录分类中，属史部谱牒类，赵翼本人也是一大史学家，但其《陆放翁年谱》却收在其《瓯北诗话》中。又缪煊章《云樵外史诗话》卷一专论查慎行诗，也是“取《行状》、

《墓志》、《年谱》并择取他人论初白诗汇成一卷”。这是诗话与史学的沟通；又如，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七、卷八分别就元遗山《论诗三十首》及王士禛《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》加以笺说，这又是诗话旁通于笺注之学。至于诗话中考证是非、辨别真伪，更是俯拾可得。这正是受到考据学风影响的结果。所以李之鼎在《通斋诗话·叙》中指出：“考据之学，滥觞于国初诸老，盛于乾、嘉，遂成一代专门之学。降及道、咸，流风余韵，就有存者。江都蒋叔起先生，淹贯群籍，著作等身，每读其撰述，慨然向往其人。先生暮年所著，……《通斋诗话》二卷，……读之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。……征引翔实，考证详明。”即为明显的例子。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是，清代诗话所表述的理论主张，尽管有“神韵”、“格调”、“肌理”、“性灵”诸说之不同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，即都强调一个“学”字，也就是说，都认识到创作的提高不离开学问的增长。以袁枚而论，他是清代诗坛上“性灵说”的倡导者，其《随园诗话》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诗话之一。在《随园诗话》中，袁枚不止一次提出“学”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余每作咏古、咏物诗，必将此题之书籍，无所不搜。”（卷一）又说“考据家不可与论诗。……然太不知考据者，亦不可与论诗。”（卷十三）可见，即使是主张诗写“性灵”的袁枚，他也主张以学问济性情。这一风气影响及于清代诗坛，便是“学人之诗”的形成，并一直沿续到近代的同光体诗人，至陈衍的《石遗室诗话》也还是反复强调这一主张。

考据学风对诗话的负面影响是，作为此一学风的反拨，一些诗话的作者强调诗的“性灵”、“才情”，反对一味“考据”、“抄书”。这一方面是理论上的相争，另一方面，在一种理论的支配下，必然出现一种代表其理论的诗歌，所以，或许更为重要的，这也是创作实践上的较量。只是前者明显，后者隐晦而已。

由考据之风而导致诗歌理论上对“学”的强调，由对“学”的强调而导致诗歌创作上“学人之诗”的出现，于是，作为一种回应，在理论上也就出现了对“学人之诗”的批评。刘声木《蓑楚斋随笔》卷三指出：“（翁方纲）诗实阴以国朝汉学考证之文为法，……每诗无不入以考证。虽一事一物，亦必穷源溯流，旁搜曲证，以多为贵，渺不知其命意所在。而爬罗梳剔，诘曲聱牙，似诗非诗，似文非文，似注疏非注疏，似类典非类典。袁简斋明府论诗，有‘错把钞书当说（当为“作”）诗’之语，论者谓其为学士而发，确为不谬。”

实际上，这两方面的影响有时也会交叉、重叠出现于一个人的诗话中，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袁枚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五云：“人有满腔书卷，无处张皇，当为考据之学，自成一家。其次，则骈俪文，尽可铺排，何必借诗为卖弄？《三百篇》至今日，凡诗之传者，都是性灵，不关堆垛。唯李义山诗，稍多典故。然皆用才情驱使，不专砌填也。余续司空表圣《诗品》，第三首便曰“博习”，言诗之必根于学，所谓不从糟粕，安得精英也。近见作诗者，全仗糟粕，琐碎零星，如剃僧发，如拆鞋线，句句加注，是将诗当考据作矣。虑吾说之害之也，故续元遗山《论诗》，末一首云：“天涯有客号聆痴，误把抄书当作诗。抄到钟嵘《诗品》日，该他知道性灵时。”这段文字体现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。由此可见，清代的考据学风与清诗话之关系是十分密切的。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学风，那么，仿而效之，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诗话了。

五 清代诗话与地域

清代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它的地域性，清人的许多文化活动都往往与地域有关。反映在学术上，则有徽州学派、苏州学派与扬州学派；反映在散文上，则有桐城文派与阳湖文派；反映在词学

上，则有浙西词派、阳羨词派与常州词派。而有清一代，以地域编纂的书籍之丰富，地方志之发达以及文人对乡土风物颂扬之热衷，都是极其突出的。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与影响，清代诗话中也大量出现了以某一特定地区为论述对象的诗话，从而形成了地域性特征。

作诗话而区分地域，并不开始于清代。刊于万历三十年（壬寅）的明代郭子章《豫章诗话》六卷当为最早。但是，由于明代人的地域观念不如清人来得强烈，所以，一则此类诗话不多（我所见者仅此一种），二则即使就上种诗话而言，也不是很严格的地方文献，疏漏错谬，在在有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《豫章诗话》提要指出的“卢仝、韩愈用‘龙鍾’、‘跼蹐’字之类，亦无与豫章”，即为一例。所以，这类诗话几乎未能发生影响。

清代地域性诗话以裘君弘《西江诗话》为最早。此书刊于康熙四十二年，共十二卷。据裘氏所撰《记〈西江诗话〉缘起》说，他本意是欲为《江西通志人物补》，而最先完成的是《敬恭录》，《西江诗话》则是其副产品。所以刘廷玑《西江诗话·序》云：“名曰‘诗话’，微显阐幽之心也。系以‘西江’，恭敬桑梓之义也”。清人所撰写的地域性诗话，大多具有此一特点。他们往往借助诗话，来表现某一地区的人物山川之美，充分显示了文化的地域特征。如顾鹗《紫琅诗话·自序》谓其：“抑亦眷恋桑梓而志庭训之肇起与髫龄之夙好云尔。”顾仰基《霏隐诗话·自序》亦云：“今特将同、光两朝文人之吟咏，暨道、咸遗而未刊者，旁搜试帖，穷蒐而汇集之，例以生存者不录，使先哲之遗墨不与草木同腐，以志不忘。”不难看出，由于地域观念的浓厚，即使仅在一乡一邑，也要出现数种诗话，以专门记录其乡先辈之作，可见此种观念之深入人心。而《西江诗话》正是开风气之先者。

《西江诗话》中所体现出的清代地域性诗话的另一个特征，

是其征文考献的文献价值。裘氏《自序》云：“详爵里出处，考时代先后。名公巨制，连幅不述；人微事眇，只字必登。凡以征文献之阙遗，补志乘之渗漏。总祈无失乎‘维桑与梓’之意而已矣。”这实际上是清代考据风气与地域观念的结合。在清代诗话中，此一现象亦颇为普遍。戴璐《吴兴诗话·序》谓其书“征文考献，具有苦心，庶几前贤芳躅，不致湮没无传。而一邦文献，藉以留贻，或以补志乘旧闻之缺。”又赵绍祖《泾川诗话·跋》云：“所纪皆旧闻轶事，以及诸前辈搜奇吊古之作，既足备一邑之典故，而往来赠答、奇篇警句，亦无不萃而集焉。”再如汪沅《榕城诗话·序》称此诗话“援据繁博，足以补林谿、梁克家、陈鸣鹤诸志乘之未备。”阮元《广陵诗事·自序》亦谓其书“大指以吾郡百余年来名卿贤士、嘉言懿行，综而著之，庶几文献可征，不致零落殆尽。”均为其例。总的说来，这类诗话理论性不够强，在诗学上几无贡献。它们或刊载全篇，或仅登警句，后人从事大型总集的编纂、校勘以及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、研究，这类诗话还是可资利用的。

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，由于诗话这种形式具有“体兼说部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五“诗文评类”小序语）、甚至“以代说部”（袁洁《蠡庄诗话·凡例》）的特点，因而决定了其内容上的特点是弹性较大、包容面较广。所以，某一时代的风气也就比较容易在诗话中反映出来。章学诚说诗话的作者“挟人尽可能之笔，著惟意所欲之言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卷五《诗话》），这也是由诗话这种体裁本身所决定的。它一方面提供了人们以便利的说诗方式，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批评的泛滥，故前人每有“诗话作而诗亡”之叹。今人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，过于看重诗话，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，这一偏向或许是需要稍加修正的。

注：

①张洎《贾氏谈录》云：“世传《周秦行纪》，非僧孺所作，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（王先谦校本）卷十三“小说类”《周秦行纪》下云：“牛僧孺自叙所遇异事，贾黄中以为韦瓘撰。瓘，李德裕门人，以此诬僧孺。”

②郭绍虞《宋诗话考》中卷《童蒙诗训》下云：“窃谓洛蜀二党，在当时原不如新旧党争之烈，亦非尽关学术上之争论。”所以，如吕本中所撰之《紫薇诗话》及《童蒙诗训》，有新旧党争的痕迹，而未受洛蜀之争的影响。

③今人周祖谟有《〈后山诗话〉作者考辨》一文，认为仍是陈师道所作，似根据不足。

④北宋末年禁诗，诸书颇有记载，如《避暑录话》卷下：“政和间，大臣有不能为诗者，因建言，诗为元祐学术，不可行。”又《石林燕语》卷九：“政和末，李彦章为御史，言士大夫多作诗，有害经术。”

⑤临济门庭颇峻，后人多有以拟黄庭坚者。周紫芝《见王提刑书》云：“具茨元不伐勋，太史黄公客也。具茨一日问作诗法度，向上一路如何。山谷曰：‘如狮子吼，百兽吞声。’他日又问，则曰：‘识取关捩。’具茨谓鲁直接近后进，门庭颇峻，当令参者自相领解。”可参。

⑥刻本“门”字均误作“间”字。叶廷琯、叶德辉校补《石林诗话》，亦失校。学者不辨，辄有误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